

名誉主编 巴金

怀念大时代

houhuo
收获 wenku 散文卷5

文匯出版社

《收获》文库 ● 散文卷 · 5

怀念大时代

名誉主编/巴 金

主 编/李小林 肖关鸿 肖元敏

选 编/许国良

责任编辑/戎思平

封面装帧/袁银昌

出版发行/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复旦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69,000

印 张/16.375

印 数/1—5000

ISBN7-80531-568-X/I·68

定 价/32.00 元

代 序

想着《收获》，我不能不想到靳以，他是《收获》的创办人，又是《收获》的主编，我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助手。他用自己的心血哺育这个新生的孩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不声不响地献出全部精力。多出人，多出作品，这就是他的雄心壮志。五个人办这样一个大刊物，他并不感到工作繁重。他发病住院的时候还在看校样，写信组稿。虽然刊物也遇到一些麻烦，但是在他一生创办的刊物中，《收获》算是办得最顺利，而且销路最大的了。没有想到，他为这个刊物工作的时间就只有短短的两年，刊物按照他的希望成长发展，走上自己的道路，他却意外地闭上了眼睛。他留给我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收获》的第一次停刊。事情发生在他逝世后一年。

1964年1月，《收获》在上海重现。人们称它为“新收获”，或者“小收获”，它不是原来的《收获》，中国作协也没有复刊的计划。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上海作协分会将别的杂志停刊，改出“新收获”，记得是以群在领导，肖岱同志做实际工作。但是“大写十三年”的口号已经提出，在张春桥、姚文元虎视眈眈的目光下，刊物注定要走向毁灭，努力和挣扎都没有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锣，不但“新收获”给革命左派砸烂，连以群也挨批挨斗、跳楼身亡。在“文革”期间我才知道“新收获”为了发表我的文章，曾遭到张春桥的训斥。

《收获》第三次出现，在1979年1月。它是上海的《收获》，不过

复刊在乌云消散、蜘蛛网砸烂的时候。新的《收获》仍然走着团结作者、为读者服务的道路，严肃地、沉默地一步一步地前进。路越走越平坦，脚步越走越踏实，刊物同读者、同作者的联系愈来愈密切。仿佛一闪眼间新的《收获》就到了第九个年头，前面一片亮光。刊物在读者中间扎了根，孩子一天天发育成长，难道我不高兴？这些年我再也看不见黑蜘蛛的阴影，再也不用战战兢兢地听老爷们的训斥，难道我不高兴？

我高兴。但是对刊物的发展，我并不曾尽过力，我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发言。要是勒以能活到现在，那有多好！他做了一件好事，人们不会忘记他。我又老又病，作为挂名的主编，我应当休息了。我羡慕正在为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刊物走上了一条宽广的路，你们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只要能团结人，只要不脱离读者，你们会得到支持的。

巴金

目

录

1. 巴 金 代序

1992 年

- | | | |
|------|-----|--------|
| 1. | 李 锐 | 寂静的高纬度 |
| 29. | 沈从文 | 从文书简 |
| 46. | 萧 乾 | 萧乾书简 |
| 66. | 夏 衍 | 无题 |
| 68. | 姜德明 | 散落的故事 |
| 78. | 王元化 | 白藤湖书怀 |
| 82. | 邵燕祥 | 断梦编年 |
| 101. | 刘 纳 | 落帆的印象 |
| 110. | 公 刘 | 活的纪念碑 |
| 145. | 史铁生 | 随笔十三 |

1993 年

- | | | |
|------|-----|---------|
| 163. | 余秋雨 | 一个王朝的背影 |
| 181. | 张 洁 | 潇洒稀粥 |

- | | | |
|------|-----|-------------|
| 188. | 冯英子 | 自是人间有正声 |
| 198. | 叶兆言 | 纪念 |
| 218. | 高晓声 | 家乡鱼水情 |
| 233. | 荒 煤 | 历史的遗憾 深深的怀念 |
| 251. | 余秋雨 | 抱愧山西 |
| 273. | 巴 金 | 最后的话 |

1994 年

- | | | |
|------|-----|--------------|
| 279. | 卞之琳 | 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 |
| 283. | 江弱水 | 圈子外的圈子外 |
| 290. | 王得后 | 夕阳下的王瑶先生 |
| 299. | 张 炜 | 夜思 |
| 325. | 李 辉 | 秋白茫茫 |
| 340. | 王辛笛 | 断想 |
| 342. | 王圣思 | 记忆化作春泥 |
| 349. | 余秋雨 | 遥远的绝响 |
| 371. | 王元化 | 自述 |
| 377. | 胡晓明 | 一切诚念终当相遇 |

1995 年

- | | | |
|------|-----|-----------|
| 385. | 陈 虹 | 父亲的故事 |
| 398. | 徐中玉 | 年老心不老 |
| 401. | 毛时安 | 活出生命的意义 |
| 409. | 罗 洪 | 悼念朱雯 |
| 416. | 陈伯吹 | 人生采访与自我采访 |
| 419. | 秦文君 | 单纯人生 |
| 424. | 汪曾祺 | 短文两篇 |
| 427. | 李 辉 | 凝望雪峰 |

- | | | |
|------|-----|-------------|
| 446. | 黄 源 | 我是怎么走向文学道路的 |
| 450. | 陈 军 | 怀念大时代 |
| 457. | 徐 迟 | 我悼念的人 |
| 471. | 季羨林 |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
| 477. | 许 明 | 心宇浩茫示苍生 |
| 482. | 冯姚平 | 此恨绵绵无绝期 |
| 504. | 舒 诤 | 静夜思 |
| 508. | 舒 芜 | 舒诤小记 |
| 514. | | 编后 |

李 锐

寂静的高纬度

1988年《厚土》结集，马悦然教授把它翻译成瑞典文，并由瑞典布拉别克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7月、1990年6月先后两次接到布拉别克出版社社长约翰先生的邀请，终于成行。此行并得到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赞助。事隔一年，一切记忆犹新。

好喝不过热汤面

临行前才知道，去斯德哥尔摩恰好和湛容同乘一个航班，出远门能有个伴儿当然高兴。见了面我告诉湛容有位眼科主任看了她的《人到中年》说：“这人起码有5年以上的眼科临床经验。”湛容就笑了，“我就看了点儿书，去医院呆了几天。”

1989年4、5月间访问美国的时候，我只知道英文有26个字母，英语就是用这26个字母拼来拼去。急中生智就想了一个简便的办法，干脆一言以蔽之，就学一句：I don't know English（我不懂英语）。说不懂也不全是事实，还记了一个单词：Orange Juice（桔子汁）。于是从中国到美国除了空姐送的快餐之外，我就在飞机上喝了一路的Orange Juice，到了旧金山吃第一顿真正的美国饭，一咬牛肉牙倒了。和湛容在一起用不着出这种洋相，除了一般的会话之外，她好像精通所有关于食物的用语。SAS航空公司的服务是第一流的，一等舱的服务就更好。一路10小时的航程，空姐们不断微笑着把各种食物送到嘴边：炸牛排、烤兔肉、煎鳕鱼，还有各式

各样的面包、糕点、巧克力,然后就是法国香槟,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丹麦啤酒,再加上花花绿绿的各色果汁饮料。一路上我跟谥容学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的发音,等到了下了飞机还是忘了怎么说。机舱里是一个秩序良好的饲养场,所有的肠胃都被填得满满的,填满了肚子,脑袋就都开始昏昏欲睡,空了一大半的一等舱显得有点冷清。我睡不着,找了一个挨舷窗的位子坐下。浓厚的云海遮断了飘渺的视线,眼前只有一派高远单一的青蓝色,只有一颗高远单一的太阳,一切琐碎的都被抹去,都被这大手笔的抽象升华为纤尘不染的纯粹,一个饱食的俗人无意间走到宇宙的门槛上,忽然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有点坐不住。

10 小时的航程中不断地向旅客们报告飞行状况,坐舱前面的电视屏幕上,隔一会儿就闪出一幅色彩鲜艳的地图,一道弧线标出飞行航线,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数字,飞行高度:10000 米,时速:870 公里,机外温度: -25°C , 飞机位置:东经 $120^{\circ}15'$, 北纬 $45^{\circ}28'$ ……沿着这条航线我渐渐地朝着从来没有到达过的高纬度,朝着接近北极圈的北纬 60° 线飞过去。因为有 7 个小时的时差,那天过了两个早晨两个中午。向西飞行 10 小时在哥本哈根转机,又向北飞了一小时才抵达斯德哥尔摩,领了行李走出机场的时候已是傍晚了,而且正下着雨。正走着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隔着晃动的人头看见马悦然教授挥着一支烟斗在笑。走过去才知道马教授的夫人陈宁祖女士、斯德哥尔摩大学汉语系主任罗德弼教授都来了。因为访问日程不同,谥容随罗教授走,我随马教授老两口回家。

陈宁祖女士是四川人,见了面就爽快地告诉我:“你以后就叫我宁祖,叫他悦然,这样简单。”我试了试,不行。只好还是按我的习惯叫她陈老师。马教授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厚土》,讲他最近刚刚读过的曹乃谦的短篇,说他非常喜欢,正打算翻译乃谦的小说。我惊讶他对中国大陆文坛了解得如此迅速,马教授笑了,“我必须读很多才能有选择,就这样也还是读不完,中国太大了。”

淅淅沥沥的秋雨把城市弄得怪伤心的，借着灯光我觉得过了一些桥，和一些模糊的尖屋顶。早晨还在北京的家里和大哥一块喝大米稀饭，吃豆沙包子，一眨眼，到了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的地方，走在许多金发碧眼的洋人中间。自访美之后两年来经历的许多事情，也一眨眼被七个时区的距离远远地隔开，不由得就觉得有些虚假，有些陌生。有一刻，就有点神不守舍，怔怔地看着雨刷把许多泪雨从车窗上抹下去，听着车轮溅起沙沙的水声。

进了屋门宁祖就系起围裙张罗着弄晚饭，并且说知道我在飞机上吃了一肚子“洋荤”，只做点清淡的。果然片刻工夫饭做好了，热腾腾的一碗鸡汤面，上面浮了一层翠绿的菜叶，桌子上摆了两盘炒菜。马教授笑吟吟地拿出两个酒杯来：

“今天我们一定要喝一点。我有茅台，有泸州大曲。”

碰响了酒杯，马教授又说：“非常高兴你能来。”

我把酒喝下去，我更高兴，能到这儿来对我是种意外。

因为还要返回城里的旅馆，宁祖要我们快点用餐。喝下一口热汤面，顿时觉得满肚子里乱七八糟的洋味道一下子都被理顺了。

宁祖问：“怎么样？”

我说：“到家了。”

和康有为坐一会儿

因为时差的关系凌晨3点半就醒了，醒了无事就去洗澡，洗了澡还无事就打开窗帘，坐在台灯下边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等着斯德哥尔摩醒过来。先是清扫车低声的在黑暗中开过去；然后，街对面的楼房在晨曦中清晰起来；再然后，便看见满天的浓云被海风驱赶着匆匆而过。渐渐的，从裂开的云缝中斯德哥尔摩醒了：金色的朝阳平静地照在它的脸上，塔楼的尖顶，深红的屋瓦，古色古香的街道，都静静地等着阳光走过来。我注意到这里和旧金山、纽约不同，这儿看不见一幢那种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摩天大厦。

平静的斯德哥尔摩躺在平静的阳光下边，静静地沉思着，没有一丝青春的躁动和炫耀。

斯德哥尔摩是一座由 14 个岛屿 70 座桥梁编织起来的城市，波罗的海深沉的蓝色为它定下清冷的基调，高纬度斜射的阳光又给这清冷抹上一层高远透彻的辉煌。

上午马教授接我去逛市容，并专门带我去他们住所附近的一个公园玩。说公园又不是公园，沿着山坡的森林、花坛走上去，除了驯鹿、灰熊、海豹一类的动物之外，公园基本上是一个散落的村庄。村庄里星散着木头的农舍、牛棚、场院、谷垛、木磨和风车，一切都是两三百年前的模样。房屋农具都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农舍里摆着纺车、锄头、镰刀、马鞭、铁铲一类农具，壁炉里的松柴辟辟剥剥地烧着，穿着老式农家服装的姑娘，坐在粗笨的木凳上转着纺锤。所有这一切手工的劳作在瑞典都已变成历史了，都被当作文物收藏在这儿。说实话，看着这些文物并没有引起旅游式的愉快，我不知道中国的农民什么时候才能直起汗水淋漓的脊梁来办一个这样的展览。

下午还是逛市容，领路的是位老乡，叫郭川。郭川在这得了学位，已经做了大学讲师，有一份在这属于中等但却可以叫老乡们咋舌的收入。老乡带着我逛旧城，逛王宫，逛街头上趣味横生的小商店，走过许多桥，看见许多蓝色，和蓝色中的倒影，经过许多教堂和巍峨的古代建筑，我记不住那么多的名字，索性就不记，只记得如水的秋风把一座城市清澈地刮到视线中来。时间很充裕，不用急，我跟着老乡过了一座桥，又过一座桥，绕过一条街，又过一条街。累了就在街角上随便捡个椅子坐下来，看着零星的游人悠闲地来往。然后，老乡请我到一家日本餐馆吃鱼片，餐馆的名字倒是记住了，叫“将军”。走进门去，在楼梯拐角处撞见一个全身披挂浑身闪亮的“武士”，模样像是中国戏台上的武将，只是脱不尽日本式的做作和蛮横。吃了鱼片时间还早，又去看了几处地方，老乡指着一座楼房

说：“这是一所老旅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流亡出国，曾在这个旅馆住了一年多。”听见这话顿时来了情绪，旅馆的第一层是咖啡厅，完全罩在新装的玻璃里面。于是我建议：

“走，和康有为坐一会儿。”

这大约是个五星级的旅馆，大厅里的装潢金碧辉煌像是王宫。我们拣了一个视野开阔处坐下，隔了一条马路和一道白色的石栏就是海水，向左可以看见钟楼高耸的老市政厅，向右隔着桥栏可以看见不远处的水面上停泊着一条洁白的大船。老乡说那是个青年旅馆，专门给在斯德哥尔摩度蜜月的新婚夫妇住的，收费极低，但是一次只能住3天。喝着茶，郭川说许多斯德哥尔摩人都知道康有为在这儿住过。我不由就想，不知这些人是否也知道康有为为什么会万里迢迢跑到这儿住着；不知康有为住在这座旅馆里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去国怀乡，孤旅天涯，一个孤寂的中国心灵却偏偏又游荡到如此高远的寂静中来。

想想真快，从1898年到现在已是92年，许多年前康有为住在这座旅馆里的时候，一定也像我们一样曾坐在窗前看着平静如画的斯德哥尔摩。山川依旧，往事如烟，90年的岁月把康有为变成了一个依稀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只有一句话——“康有为在这儿住过。”

不知不觉中秋天的傍晚悄悄走了过来，如水的秋风之中，晚照涂金，满目堂皇，愈发衬出斯德哥尔摩的高雅和安宁，像蓄满了秋水的湖泊，明澈，清冷，却又印满了古老而辉煌的云阵。

我举起茶杯来提议，“以茶代酒，为康有为碰一次杯吧。”

于是，在那座金碧辉煌有如王宫的旅馆里，两个中国人轻轻碰响了茶杯。但是身边所有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是为了康有为。

粗话与天鹅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瑞典的一些学者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1926年由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和地质、考古学家安德森两人,共同建立了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并于1929年创办了该馆的学术刊物《通报》。从那时起,瑞典就成为欧洲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重要中心之一。马悦然教授自1946年开始在斯德哥尔摩大学高本汉先生门下学习研究中文,至今已近40多年,可谓穷经皓首,著作等身。为了了解中国,他曾在1948年到四川长期居住,并在峨眉山的一座寺庙内幽居数月,向一位高僧学习中国古代诗歌。为了研究考查佛教,又去西藏做过探险式的旅行。他曾专攻《穀梁传》、《公羊传》、《左传》,并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译成英文。历年发表的各种论文达200多篇。他翻译成瑞典文的《水浒》已经连出3版,成了畅销书,并且正在翻译另一部巨著《西游记》。他还翻译过一部分唐诗宋词,翻译了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和鲁迅、老舍的一些小说。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社会背景》以及六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手册》。1986年9月在意大利都灵召开的第30届欧洲中国学大会上,他当选为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主席。自80年代以来,马悦然教授把眼光转向中国当代文学,把许多年轻一代的诗人、作家介绍给世界。

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马、罗二位教授,要我给“斯大”汉语系的研究生们作一次演讲。跑到这么一个汉学中心里来讲什么呢?我有点犯难。可又不能不讲。想了想,干脆就讲平日所说所想,就讲“我所理解的中国和中国人”吧。可这个题目太宽太大,又想了想,干脆就从中国人的粗话讲起。讲“粗话”也有一点原由,我那本《厚土》里用了不少粗话,可谓五花八门,品种齐全,为此还引来了一些批评。其实,关于“粗话”我倒是有几分有意为之的。且不说粗话带来的语言氛围是任何一种规范、清洁的语言都不能替代的。只从行

为学的角度看,中国人每日口头上操着的粗话,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最深层的积淀。于是,我在“斯大”东亚图书馆清静文雅的阅览室里告诉研究生们:欧洲人敬上帝,中国人敬祖宗。欧洲人眼里上帝高于一切。中国人眼里祖宗高于一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乃是万世不变的天理。欧洲人骂人虽然也用猪狗一类的畜牲,但骂人最痛的是“你这个犹太”,宗教意味甚浓。中国人也有猪狗一类的骂人话,但骂人最痛者莫过于“操你的祖宗”,而且在那个性行为的动词后边有全方位、多系列、超时空的对象,万变不离其宗,都以打乱或是参加被骂者的血缘伦理关系而达到对对手的侮辱。更有甚者,吕梁山的农民嘴上最喜欢用的那一句是“日你一万辈儿的祖宗”,20年为一辈,一万辈就是20万年,20万年前的祖宗如何能“日”呢?不是泥土,也是化石了。可见这超时空、超物质、超生命的性扰乱,是为了从根儿上开始,所谓掘祖坟,所谓连根拔的意思。文质彬彬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听了我的话哄堂大笑。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家,我自信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学者,怕是难以像我这么地道地“寻根”。

但是被中国历代君王和圣贤们视为经天纬地、安邦定国的孔孟之道,就是这样不是靠书本而是靠粗话,在中国世世代代口口相传的。被敬在大雅之堂由莘莘学子恭称为经典的准则,就是这样在民众的口头上泛流弥漫而为俗语粗话,成为民众中一种最普遍的日常行为,成为全民族的潜意识、甚或无意识,成为一种最深刻、最牢固的积淀。高兴骂,生气骂,男人骂,女人骂,大人骂,小孩也跟着骂,上至国家领袖,下至草民百姓,凭着“他妈的”这样一句国骂,你可以毫无疑问地在地球上确认一种文化标志,你可以毫无疑问地辨认出一群黄皮肤黑头发的人,从而走进一个有五千年传统的渊源久远的文化。

事有凑巧,白天刚刚在图书馆讨论了粗话,晚上马悦然教授请我在皇家歌剧院看瑞典皇家芭蕾舞团的传统剧目《天鹅湖》,而且

天鹅公主奥杰塔由团里 A 角演员来扮演。票只有两张，马教授让郭川和我一起去。柴可夫斯基作曲的《天鹅湖》，自从 1878 年在莫斯科首次公演，到现在已是 113 年了，100 多年里不知被多少人演了多少次，可是那天晚上，雍容华贵的歌剧院里还是座无虚席。《天鹅湖》的故事很简单：美丽的公主奥杰塔被恶魔掳去变成了天鹅，但公主与王子齐格菲尔得相爱，最后爱情战胜邪恶，公主恢复人形。按照中国戏剧的套子说，这是个才子佳人的故事，而且是一份门当户对的婚姻。但这么一套就走味了，首先所谓才子配佳人事实上从来以男性的才子为潜在的中心，而且到头来总要弄个状元及第，榜上有名，因此也就有了一官半职的正统靠山。其次门当户对充满了钱财、地位的权衡，所以是“婚姻”不是“爱情”。优美之至的《天鹅湖》讲的是优美之至的爱情，讲的是美丽战胜了邪恶。可是中国的情人们远没有这么幸运，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只能在死后变成彩蝶双双飞；中国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只能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想起那些“粗话”，想起那个“一万辈儿的祖宗”。古往今来这个“一万辈儿的祖宗”，不知合情合理地杀了多少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知逼死多少焦仲卿和刘兰芝，甚至包括唐玄宗这样的皇帝天子也在劫难逃。最可悲惨的是后世千千万万的焦仲卿、刘兰芝们终于默认了那个情理，在默认和麻木中度过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中国有句名言，叫做“哀莫大于心死”。可是在那个合情合理的牢房里，毕竟还有生命的呼号和奔突，我想中国人嘴上骂人的粗话之所以如此的五花八门丰富多彩，之所以如此的举世罕见，倒也不可视为是一种潜意识的性反抗，一种无意识的性宣泄。人们常常可以在大街上、市场上、公共汽车上遇见对骂的场面，污言秽语喷口而出的当儿，你会看到平时麻木漠然的脸像被施了魔法，变得无比生动，那一刻间痛快淋漓的表演，可以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伟大天才的演员。可那一刻，你也会痛彻心脾地感到在千百年的禁锢和压抑之下人的丑陋的扭曲；你

也会眼睁睁地看到一种古老的衰落。

华丽的大幕拉开了,优美无比的音乐响起来,美丽善良的公主奥杰塔婀娜多姿地来到灯光聚照的舞台上,一个令人忘情的神话开始了,可那都是别人的优美与高雅。

“大战”与“文革”

第二天的上午还是在东亚图书馆的阅览室,我接受瑞典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记者的文学采访,还是由老乡郭川做翻译。既是文学采访,所谈自然不外乎是文学。谈创作经历,谈文学观念,谈中国大陆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都谈完了记者说,现在咱们随便聊聊我不再做记录了。于是他问我:

“你刚才提到上山下乡运动和一代知青作家,那种经历虽然是痛苦的,但是它毕竟使你们成为了出色的作家,你是不是这样认为的?”

我听出来这是一个肯定式的提问,而且是一个几次出国都遇到过的问题。其实在国内也有许多人这样讲:是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运动造就了一代知青作家。谢谢上帝!阿弥陀佛!如果有谁这么愿意“当”作家,我宁愿跟他换换,让他也去花10年工夫被“造就”上一次,而让我来做一个不曾被造就过的平凡的普通人。于是,我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不是这样讲的,这个问题本身有一种逻辑的偷换。不错,“文革”和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使一些后来成为作家的知青,刻骨铭心地体验了生活,体验了永生难忘的生命过程。但那并非是为了未来的作家们而设立的必修课,那是一场灾难,一场全民族8亿人的血泪交织的浩劫。是谁敢这样胆大妄为而又冷酷无情地宣布:幸亏因为“文革”我才当了作家?拿8亿人的灾难,拿上千万知青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惨痛经历来换几个作家不是太奢侈、太冷酷、也太可怕了吗?作为作家我崇尚文学,崇尚艺术,我甚至视文学艺术为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从来不相信有任何可以高于

生命的文学艺术，不管那文学和艺术是多么的自认为伟大，自认为永恒。于是，我对记者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大师层出的、整整几十年的汹涌澎湃的现代派、超现代派的艺术潮流。是否可以因此而肯定“大战”的某些合理性呢？是否可以为了再造就几个萨特、加缪或是海明威一类伟大的作家，而再来搞它一次世界大战呢？于是，我又说，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瑞典都没有参加，瑞典也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也照样产生了斯特林堡这样的大作家和英格马·伯格曼这样的国际性的大导演吗？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他原来就是作家，这不用谁来造就，更不是非要用苦难来造就。如果一定要说苦难，那也只是作家自己内心的苦难造就了作家，有的人一生历尽艰辛但默默无语，有的人却因为一场猝雨而写下了历时千载的诗句。

那天的访问或说讨论因为这个话题而谈得很深入。记者告诉我他很忙，他已经定好了飞机票，明天他就将飞往海湾，因为在那儿一场二战以来的最现代化也最大规模的立体战争正迫在眉睫，作为新闻记者，他绝不能错过这个采访的机会，尽管为此而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辞。作为一个操笔墨生涯的同行，我钦佩他这种职业的献身精神，而且我相信，他肯定能为瑞典的公众迅速及时地发出出色的报道。但我也相信他将和我一样憎恨战争，憎恨制造了战争的罪人。我还相信，这场战争终究有一天会有几个出色的作家来描述它，以此来一吐衷肠。但他们肯定会像我一样最不愿意听到这样的结论：幸亏因为有海湾战争你们才成为作家，是海湾战争造就了你们这些人——

把罪恶还给罪恶吧，
把苦难还给苦难吧，
把荣誉还给世俗吧，
我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我特别喜欢一位作家说过的话：我只关心自己是否写出好作